

彰顯中間力量 保留反思聲音

研討會打破派性邏輯，匯聚左右兩極之外的「第三種力量」

文 / 王汎森

我是在去年冬天接到余範英董事長的電話，要我來召集第二屆「公與義」討論會的。那時候我已決定結束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處的借調，回到中研院上班，余小姐也許是覺得此後我可以有比較多的時間，可以為這個盛會略盡棉薄之力吧！

但是事實上第二屆「公與義」的籌備工作在此之前一兩年就已經在進行了，余範英小姐已經邀請各界朋友談過多少次，光是釐定大會的七個主題，就已經數十易其稿。從茫茫渺渺的社會萬象中，最後決定集中在七大議題及三、四十個子題上。在討論過程中，大家發現有一個共通現象是跨越這七大議題的，那就是社會上理性討論空間的萎縮，這也是第二屆「公與義」討論會的標題會加上「理性空間」四字的原因。我們的構想是，「公平」與「正義」這兩大原則是永遠不變的，但是隨著每次開會的時空特殊性，應該加上一個次標題，以突顯其

重點。

我之所以不憚煩瑣追述這一段故事是想強調，這個會的靈魂人物是余範英董事長，而我只是在整個構想已經成形之後，負責推動執行，用我自己的字眼就是「跑腿」。但是「跑腿」也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首先要有時間，第二要有後勤支援，這對當時的我而言都有點困難。

照理剛結束人文處長的行政工作回到中研院，時間應該是有的，但是當時我正處於相當緊張的心情，急著整理那些快要爛在肚子裡的研究構想，趕著寫答應人家的論文，所以時間並不大夠。「後勤」更是一個大問題，回到中研院，沒有秘書，沒有傳真機，我的研究室離開事務室又遠，每天開門關門走進走出地收發各種開會資料，有時碰到隔壁同事，都覺得有點難為情。

集結社會菁英

不過時間與後勤仍屬操之在我，而操之在人的事，就不易解決了。我們為了各個

議題的召集人、主講人、與談人，絞盡腦汁想要找到最適當的人，但是最合適的通常就是最忙碌的人，要把各路人馬湊在一起開會前會變得非常困難。在那些日子裡我常常想起西洋中古時代有一位熱衷號召十字軍東征的教皇，他每天到港口等候答應前來集合的船隻，可是來者寥寥，他廢然而歎：「今天以前，有我無船，從今以後，有船無我！」這個故事是引喻失義了，但實情偶或近之。在這裡我要特別鄭重地謝謝七個議題的召集人，他們與我一樣東奔西走，使得整個會議能充實而順利。他們分別是吳英璋、洪蘭、朱雲漢、林萬億、林子儀、馮建三、林聖芬、錢永祥、林孝信、倪炎元。我同時也要感謝時報文教基金會同仁不眠不休的努力，使得整個活動很光鮮，很有活力。

我一開始籌備這個會時就再三提到，這個會是為了彰顯社會中一股中間的力量，希望在左右兩極之間，仍能保留一股反思性的聲音，這

些聲音未必悅耳，但是卻少不得。

我個人近年來最大的感慨之一是社會上有公信力的人愈來愈少了，左右兩極之外的「第三種力量」也愈來愈萎弱，對一個民主社會來說，這並不是一件好事，當國家社會遇到重大而繁難的爭論時，總應該還有幾個人能說幾句冷靜、公道的話，而且這些話也還得要有人能聽得進去。

摒除左右框架 再創全新的可能

多年前我讀過美國老一輩的思想史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The Age of Reformers》，這本書的內容差不多全忘光了，但是有一段話卻長留腦海中，他的意思是社會中的「第三種力量」是註定不會擁有實際力量的。霍夫斯塔特悲觀地說：所有實際的權力皆向左右兩邊集中，它們會藉著協調整合各種利益而壯大，一旦居於權力核心時，它們會向各方面妥協，以維持其權力優勢，其行動



◆研討會總召集人王汎森暨各組召集人總結會議成果。

的原則是「扈從」主義而不是政治原理。但霍夫斯塔特也說，「第三種力量」的功能是刺激、教育、產生新想法、為政治文化提供新活力。我想，當言論世界傾向左右兩極，任何一個議題都迅速滑向兩邊，用派性邏輯來加以簡化、模糊時，是應該有一些「不合時宜」的人說一些話，提一提神。

我們不敢說兩天的會開得非常成功，非常有影響力，但是從與會者熱切的眼神中可以看出，還是有不少人關心這些嚴肅的議題，在會議期間雖然有咄咄逼人、有爭吵，甚至有人身攻擊，當時不免讓人捏把冷汗，但現在回憶起來，卻都是很有意味的插曲。

作為一個總召集人，我的

心情始終是緊張的，深怕把事情搞砸了，所以在會前的通告及一場又一場的會前會中，總是設想得太細，希望主講人和與談人能「傾囊相授」，以致於一位與談人在會場上公開說，她不知道在一千五百字中如何同時要指出病根，要剖析現狀，還要提出可能的解決辦法。我當時聽了也不覺莞爾，是啊！

這怎麼可能辦得到呢？

最後我要特別說幾句話：余範英董事長及時報文教基金會在大眾都懶得再做點什麼的時候做這些事，寧願冒著嚇跑讀者的危險，也要把討論會的要點一版又一版地刊登在中國時報上面。我要藉這個機會向她／他們致意。（作者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